

耶穌會士劉松齡在華事蹟述略

周萍萍

[提要] 乾隆年間，中國已經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播。乾隆四年（1739），擁有淵博科技知識的耶穌會士劉松齡來華，並以宮廷天文學家和數學家的身份奉旨進京，在欽天監任職達三十餘年，直至終老。本文利用中西文資料擬對劉松齡在華事蹟作簡單考述。

[關鍵詞] 耶穌會士 劉松齡 欽天監

[中圖分類號] K249.5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4) 01 - 0160 - 07

劉松齡（Augustin Ferdinand von Hallerstein），字喬年，1703年出生於卡爾尼奧拉（今斯洛文尼亞中心地區）的舊貴族家庭，1721年加入耶穌會，1738年乘船來華，1739年以宮廷天文學家和數學家的身份奉旨進京，在欽天監任職達三十餘年，直至終老。1774年劉松齡去世後，安葬於北京阜成門外的傳教士墓地，其墓碑上所刻的“勤敏監務，敬寅恕屬，德業兼著”等數語可謂是對其在華經歷的最好評述。但由於劉松齡所出生的卡爾尼奧拉歷史上曾屬於哈布斯堡王朝統治區域，而該地區歷史變遷頻繁、有著極其複雜的多國遺存，因此學界對劉松齡的研究並沒有足夠重視。^①本文利用中西文資料擬對劉松齡在華事蹟作簡單考述。

劉松齡是雅奈·斐迪南·哈勒施泰（Janez Ferdinand Hallerstein）男爵的兒子。男爵是維斯塔湖（阿爾本）附近的莊園領主、卡爾尼奧拉州的總督，擁有法蘭克人血統。劉松齡的父母共生育了四個男孩、七個女孩，劉松齡是這個孩子眾多家庭中的次子。在他出生之前，他的母親遇到一些麻煩，因此他是家中唯一一位出生在盧布爾雅那的孩子，其他兄弟姐妹大都出生於孟格斯城堡。

劉松齡在盧布爾雅那接受了基礎教育，1721年在奧地利加入耶穌會。1723年7月12日，他在格拉茨第一次請求到中國傳教，但是十年後他的請求才被批准。劉松齡到海外傳教的興趣濃厚是受其叔叔埃伯格（Inocenc Volbenk Erberg）的影響。其叔叔於1726年後在巴拉圭傳教，並於1738年成為烏拉圭聖路德維希修會會長。

劉松齡被批准前往中國，緣於其受過良好的天文學、測繪學等方面訓練。那時，中國已經

禁教，惟擁有一技之長、可以為宮廷服務的西洋傳教士方可在中國留居。康熙末年，因羅馬教皇下令禁止中國教士、教民“祭祖”、“敬孔”，從而引發“禮儀之爭”，康熙皇帝遂在教廷禁約上硃批：“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③從此天主教在中國失去了公開傳播的自由。雍正即位以後，對天主教態度冷漠，表示：“果係精通歷數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效用，餘俱送至澳門安插。”^④1735年，雍正去世後，乾隆繼位。資料顯示：“乾隆皇帝禦極以來，督撫捏奏，禁聖教之諭旨，急於星火，從未停止”^⑤。但因乾隆特別喜好西洋科技、工藝等，在欽天監、如意館中仍留有西洋傳教士為之效力，故而“雖嚴禁其傳教，而優待之禮，猶未衰也”。乾隆對在京傳教士的優渥使得“西士不辭勞瘁，盡心修曆，以為藉修曆末事，尚可稍緩禁議，不無補於傳教，是以樂從不倦”^⑥。

這種情形之下，擁有淵博科技知識的劉松齡得以被選中前往中國。因葡萄牙對東方傳教區享有保教權^⑦，因此劉松齡在出發之前拜訪了葡萄牙王后瑪麗亞·安娜（Maria Ana）。王后贈給他250枚葡萄牙銀幣、一隻純金鞋子、一架小手風琴和為北京聖若瑟會院準備的一隻裝在玻璃球裡的鐘錶。1738年5月11日，劉松齡等十一位耶穌會士搭乘葡萄牙商船前往澳門（在搭載葡萄牙船隻前往遠東的耶穌會士中，劉松齡是第1837位）。

1739年，劉松齡以宮廷天文學家和數學家的身份奉旨進京，得到乾隆皇帝的寵眷，在欽天監輔佐戴進賢（Ignatius Kögler）神父治理曆算。1746年，戴進賢神父去世後，乾隆隨即命劉松齡升補監正。《清實錄》載：“乾隆十一年丙寅閏三月壬子。諭曰：欽天監監正戴進賢病故員缺，著監副劉松齡升補。其所遺監副員缺，著欽天監揀選西洋人。”^⑧

二

當時，欽天監主要負責觀察天象、推算節氣、制定曆法等事務。因為曆法關係到農時，再加上古人相信“天人感應”，認為天上星象的變動直接對應著地上人事的變更，因此欽天監的地位比較重要。而自滿人入關後，精通曆法的西洋傳教士一直受到朝廷重用。明清鼎革之際，來華耶穌會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以一部《時憲曆》奠定了在新朝的地位。之後，相繼在欽天監任職的耶穌會士有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安多（Antoine Thomas）、徐日昇（Thomas Pereira）、閔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龐嘉賓（Caspar Kastner）、紀理安（Kilian Stumpf）、戴進賢、劉松齡、傅作霖（Felix de Rocha）、高慎思（José d’Espinha）、安國寧（André Rodrigues）、索德超（J-B. d’Almeida）和畢學源（Gaetan Pires-Pereira）。^⑨其中以劉松齡的任職時間最長，近三十年。

耶穌會士所供職的欽天監因職能特殊，故設有觀測天象的外設機構觀象臺。觀象臺位於北京城東南，“因城而築之，可窺中禁。上有儀器，多係禦製，且是國家重器，宜不可妄許人入也”。觀象臺以及其內的天文儀器均由皇家掌管，尋常人等不能隨意觀瞻，劉松齡曾在回答朝鮮使臣問題時說：“觀象臺係禁地，閒人不得雜近。親王大人輩，亦不得擅進”^⑩。乾隆九年（1744），劉松齡曾代替腿腳不好的戴進賢恭迎乾隆帝巡察觀象臺。西文資料顯示：“乾隆離開皇宮前往觀象臺，許多士兵和穿正式朝服的大臣都隨從前往，乾隆乘坐禦輦行在後面。欽天監的滿洲官員和劉松齡被安排在乾隆附近。戴進賢的腿腳不好，因此劉松齡代替他迎接了聖駕。”^⑪

古時，天象與氣象是不可分的，觀象臺的儀器精良與否直接關係到天象觀測的準確性。在1744年的巡察中，乾隆認為渾天最符合中國的測天傳統，而時度劃分則以西法為優，若將二者結

合將更加完美。欽天監監正戴進賢遂奏請乾隆帝恩准鑄造一架新的天文儀器。得到皇帝批准後，該儀器由戴進賢負責設計、監造。1746年戴進賢去世後，便由新任監正劉松齡繼續監造。

乾隆十七年（1752）十一月十二日，莊親王允祿和禮部侍郎何國宗向乾隆帝進“增修儀象志恒星圖表”一摺。乾隆下旨：“新測恒星並增星圖像，著照乾清宮陳設天球式樣製造兩分進呈”^⑩。為了儘快製造新的天球儀，允祿、何國宗會同監正劉松齡、監副鮑友管（Anton Gogeišl）率建造工匠等人細細量看乾清宮陳設的天球式樣，並同內務府司員不時前往查看，“照式成造”。乾隆十九年（1754），在劉松齡的主持下，用當時流行的西方360度制結合明代渾儀模型建造的觀象儀器“璣衡撫辰儀”鑄成，用來測量天體的赤道座標度數。“璣衡撫辰儀”製作精美，是清代所鑄最後一架大型精密渾儀，代表了那個時代儀器製作的最高水平。“璣衡撫辰儀”的製成，標誌著“中西科學的結合與應用又有了新的進步”^⑪。

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第六子、質郡王永瑤奉旨帶領劉松齡等查看明代製造的天體儀，發現成化年間所製的一件儀器因年代久遠，“星位度數不能相同”，另一件正統年間所製的天體儀與此相同。劉松齡等奏稱：“此儀腔內所襯銅飾既已脫落，輕重不一，旋轉不定，難以改造修理”，乾隆遂下令將此二儀熔化鑄造成銅獅或銅麒麟進呈。翌年四月十四日，總管太監桂元傳旨，令永瑤派人會同劉松齡等“著照圓明園淳化軒現設天儀、地儀尺寸，再造二件。”於是，劉松齡會同造辦處等開始製作天儀、地儀，“造成時另行呈覽”^⑫。

除在中國製造天文觀測儀器外，劉松齡也曾向歐洲購買或索要了一些。例如一些天文現象必須從遙遠的地理觀測點、使用精準的時鐘和六分儀進行觀測。1750年9月18日，劉松齡給保持合作關係的倫敦皇家學會寄去一封信，信中他提到需要一些觀測儀器。劉松齡可能希望自己在北京的儀器設備清單看起來很不完備，以期引起倫敦皇家學會的同情。他這樣做非常成功，因為在以後的幾年內倫敦皇家學會成員為他訂製了幾個新儀器，並贈送了一些用於交食觀測的儀器。^⑬

那個時代，北京與歐洲之間的通信往來費時較長，有些信件甚至要歷時兩年多才能到達，但是劉松齡在華期間一直與同時代的歐洲頂尖科學家保持書信聯繫。在那些信中，劉松齡介紹了在中國進行的各項科學觀測以及與聖彼得堡、倫敦、巴黎科學院等展開的合作，有時也請求歐洲寄送一些書籍、儀器設備等到中國。例如，曾服務於聖彼得堡科學院的葡萄牙籍猶太人桑切斯（Antonio-Nunes Ribeyra Sanchez）於1750年為劉松齡準備了一架14英尺長的天文望遠鏡。此前，桑切斯曾於1747年請自己在倫敦的朋友薩克拉門托（De Castro Sacramento）把貝維斯（John Bevis）製造的用於交食觀測的設備連同說明一起贈送給了劉松齡。^⑭桑切斯還建議劉松齡購買六分儀，以更好地測量天體之間的角度。劉松齡遂向里斯本要了一個。

利用北京欽天監原有的觀測設備以及一些西洋儀器，劉松齡等人觀測了日食、月食、彗星、北極光等自然現象。顯然，劉松齡對傳教士在欽天監所作天象觀測結果的準確性感到非常自豪。1749年，他在致弟弟維切特（Janez Vajkard）的一封信中寫道：“天文測驗時常有之，如天主保我壽健康寧，成績不久將可成書一卷。除日月蝕外，尚須測驗木星諸衛星之出沒，恒星行星之受月蝕，與恒星比較所知行星之運行。總之，一切現象盡在測驗之中。吾人有測微器一，報時計一，皆甚優良，又有半徑二尺之四分圓儀一具。”^⑮

在所觀測的天象中，能夠正確預測日食對於來華耶穌會士而言特別重要，因為中國皇帝非常重視日食的觀測和推算。他們認為在上天所顯示的各種天象中，日月交食是最嚴重的警示，統治者需要趕快進行各種自律、檢討和補救，使地上的一切行之有序。《史記·天官書》載：“日變

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因此，劉松齡掌管的欽天監需要提前預測一年中所有的交食以及各種異常的自然現象，並對之進行占卜。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九月十七日，劉松齡等為觀候月食事題：“候得十六日夜子初一刻七分下偏左初虧，十七日子正二刻一分食甚，丑初二刻十分下偏左複圓。臣等謹按占書曰：月秋食西方災。甲日月食，年多魚，禾麥傷。又曰：三日內有雨則解。”^⑭

來華耶穌會士還繼續了中國人的彗星觀測工作。中國人觀測彗星的歷史比較久遠，最早可以上溯到殷商時代。《淮南子·兵略訓》載：“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至汜而水，至共頭而墜。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確切記錄了哈雷彗星的回歸。劉松齡在寄往倫敦的一封信中，描述了自1742年3月初至4月初在北京觀測到的一顆彗星運行軌跡。除了有關資料外，劉松齡還增加了一些解釋。這正是那年觀察到的第一顆彗星。1748年11月6日，在寫給倫敦皇家學會成員莫蒂默（Mortimer）的一封信中，劉松齡報告了自己在1748年4月27日至6月18日間對彗星C/1748 H1進行觀測的結果。劉松齡向倫敦皇家學會彙報的彗星記錄值得稱道。1655年至1840年間，倫敦皇家學會出版了90份關於彗星的報告，其中大部分來自1737年至1795年間。^⑮

除彗星外，劉松齡還觀測了1750年7月29日至10月22日之間行星陰影裡三顆木衛的隱沒。他在日出前的清晨作了八次觀測，在日落後的傍晚作了另外四次觀測。他對木衛一作了六次觀測，對木衛二作了四次觀測，對木衛三作了兩次觀測。1770年9月17日，劉松齡在離北極點50多度、北緯39度54分的地方觀測到了極光。北京比斯洛文尼亞稍偏南一些，北極光發生在那裡比較罕見。北京從沒有人像劉松齡那樣這麼仔細地觀測過北極光。

劉松齡對北京南面的喀斯特地形也非常瞭解，他是第一位研究中國喀斯特地貌的卡尼奧拉人。1749年11月28日，劉松齡在信中向弟弟維切特描述了所測繪的木蘭地區喀斯特地貌。木蘭地區位於今天河北省長城的東北面，每年仲秋，皇帝都要來木蘭圍場打獵，因此特別需要一幅清楚標注其狩獵範圍的地圖。乾隆十四年（1749）七月十六日，乾隆帝傳旨：新畫紙木蘭圖與舊木蘭圖較之，地名舊圖上有新圖上沒有，新圖上有舊圖上又沒有，著郎世寧同劉松齡、傅作霖斟酌，准照舊圖上山式，另畫木蘭圖一幅。^⑯傅作霖和劉松齡繪製了北緯41.5度至42.5度之間這1度寬1度長區域的地圖，那裡有處於溫帶半乾旱半濕潤氣候的岩溶地貌。他們在地圖上標明了最適合狩獵的區域，乾隆帝非常高興。劉松齡從木蘭地區剛一回京，乾隆就親切召見了他，並就地圖上所標示的村鎮一一詢問。

三

至1773年春季，劉松齡一直在欽天監負責天象觀測。期間，劉松齡曾因前往澳門接引葡萄牙使臣巴哲格（Francisco Xavier Pacheco Lampayo）來京有功賞給三品職銜。史料記載：乾隆十八年（1753）四月初四日，內閣奉上諭，“此次西洋貢使來京，劉松齡前往接引，沿途辦理一切，甚屬黽勉，著加恩賞給三品職銜食俸。再，伊等照料貢使，不無需費之處，著加恩賞給銀二千兩。欽此”^⑰。

儘管得到乾隆帝的恩寵，但是一直服務於宮廷的劉松齡並沒有太多傳教的自由。如同在其之前的傳教士一樣，劉松齡等人均把天文觀測、地理測繪、鐘錶製作等技藝視作打開中國傳教大門的敲門磚，其引入西洋科技的根本目的是為勸化中國人入教創造條件與機會。劉松齡曾說：“吾人之蒞此，不在推進改正天文圖表，顧為保障救護吾教，不得不假手於天文，因此吾人盡其所能

為之，而始終願將所得成績通知於關心此節而能輔助吾輩之人。”²¹

但是乾隆帝卻只喜歡西洋科技，對傳教士所宣揚的天主教並無好感。乾隆曾表示：“國家任用西洋人治曆，以其勤勞可嘉，故從寬容留。滿漢人民，概不准信奉其教。”²²只是因為乾隆在位時期較長，地方官府不可能一直對天主教嚴加防範，故而在教禁相對鬆弛之時，傳教士亦可悄悄活動。但乾隆時期教案不斷，甚至有被處死的傳教士。劉松齡在寫回國的信中就曾記述了乾隆十二年（1747）江南教案中被官府抓獲、處死的談方濟（Tristan d'Attimis）神父，並談及自己與傅作霖神父都曾遭到指控，反教官員指責他們“將祈禱書、圖像、念珠及其他信物散給被教難之教民”²³。所幸乾隆沒有對此事進行深究，最終也就不了了之。

皇帝的不追究並不意味著臣屬們態度的友好。乾隆二十四年（1759），兩廣總督李侍堯向乾隆進呈“防範夷人”一折，指責劉松齡等奏請西洋傳教士赴京效力，都以澳門來信作為托詞，而這些信件都是由內地人代為轉達，李侍堯請求皇帝下令禁止這種私相轉遞的行為。軍機處贊同李侍堯的主張，答覆道：“嗣後西洋人寄居澳門，遇有公務轉達欽天監，應飭令夷目呈明海防同知，轉詳督臣，分別咨奏”²⁴。後來大臣們雖同意洋人往來信件可由提塘轉遞，但仍堅持“查中外之防閑不容不密”。

顯然，大臣們擔心傳教士與西洋國家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對他們抱有戒備之心並嚴加防範。於是，劉松齡等利用在朝廷做官的機會，積極與一些官員交好，希冀這樣可以對傳教事業有所幫助。他們這樣做還是有一定效果的。1766年，劉松齡在一封信中寫道：“吾人謀與朝中諸臣訂交誼，是為吾人配慮之一事。此事甚為有益，茲舉一例以明之。某次曾以歐洲禮物贈給某官，其人數年後出任山西巡撫。蒞任後，聞有一傳教士在獄中，又有人訴教民於官，因思及松齡所贈之禮物，遂出傳教士於獄，而銷其案。”²⁵

儘管劉松齡等利用一切時機宣傳天主教教義教理，造訪天主堂的人也較多，但是真正領洗入教者並不多。劉松齡曾在一封信中感慨道：“來堂過訪者，對於堂中繪畫有所詢問，吾人必為之詳細說明。聽者雖樂聞吾輩言，然因而入教者甚稀。”²⁶而且禁教政策之下稍有不慎，教士、教民都會惹上不盡麻煩。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剪辮風波雖然與傳教士沒有任何關係，但是反教者乘機渲染信徒所用的念珠、耶穌被釘十字架的苦像等都是使用邪門妖術的證據。一時間群情惶惑，物議沸騰，“被告發信教官吏二十二人及其他數人，其罪名則為信仰禁止之教”。傳教士深恐被逐出境，不能延續在華傳教事業，“劉松齡神甫與欽天監同僚二人，盡其所能以真情向帝表白”²⁷。最終乾隆帝雖然沒有降罪於傳教士，但是將“欽天監衙門奉教職官七八員斥革，又將教中尤著名之教友，枷號板責，以息眾怒”²⁸。

四

1773年11月13日，劉松齡向乾隆提出辭呈。劉松齡在奏摺中寫道：“臣自乾隆四年進京，八年蒙皇上擢用，補欽天監監副，十一年升補監正，十八年又蒙皇上賞給三品俸祿，教養生成三十餘載，殊恩異數，自問未有涓埃足酬高厚於萬一，感愧交甚，何敢圖便己私，少萌退念？但臣今年七十有一，身雖不常病，目亦未盡花，惟精神漸消而步履艱難，近年猶能勉力行走，邇來日益衰弱，時覺足力竟不從心，實有不能隨班行走之勢，寤寐不安，用是臣敢冒瀆天聽，據實陳明，仰懇皇上仁慈，准臣休致，俾臣分可安，得以優遊歲月，僅此未盡之日，皆出特賜之恩，而我皇

上寬厚仁慈之所曲全也。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²⁸

劉松齡這樣做不僅因為自己身體不好，而且因為北京已傳來歐洲耶穌會處境艱難的壞消息。此時歐洲各國已經開始驅逐耶穌會士，且這種浪潮不只限於歐洲本土，而且已經波及到海外的殖民地，葡萄牙、西班牙、法國三國國君甚至呼籲教皇解散耶穌會。乾隆沒有同意他的請求，下旨：“劉松齡不必乞休，聽其酌量精力行走。若自度步履稍艱，即不隨班，亦從其便。”²⁹1774年7月29日，劉松齡第一次中風。他的右邊身子不能動，暫時也不能說話。後來，他的病情有所好轉，能夠在給弟弟維切特的最後一封信中述及此事。維切特讀到該信後非常難過，因為他們已經有近四十年沒見過面，而且肯定再也沒有機會見面了。

三個月後，劉松齡第二次中風，隨即去世。在欽天監任職的高慎思向乾隆帝上奏了此事，乾隆令步軍統領福隆安查辦。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三十日（1774年11月3日），福隆安謹奏：“遵旨查從前西洋人蘇霖、費隱、戴進賢、監副鮑友管病故，奉旨各賞銀二百兩。又西洋人郎世寧病故，奉旨賞銀三百兩。今病故之三品銜監正劉松齡、西洋人蔣友仁，奴才酌擬賞劉松齡銀二百兩，蔣友仁銀一百兩，謹奏。”³⁰乾隆同意按照慣例賞給。劉松齡被安葬在北京阜成門外葡萄牙耶穌會士墓地。劉松齡去世後，傅作霖接替他擔任北京欽天監監正。1774年11月12日，劉松齡去世後兩個星期，法國耶穌會士正式接受來自廣州長上的消息，教皇解散了耶穌會，由遣使會接替他們在京的工作。

自1739年抵京至1774年去世，劉松齡在中國整整生活了三十五年，而這其中在欽天監任職的時間就長達三十年。這三十年中，他所參與的天象觀測以及所作的天文記錄對那個時代的歐洲產生很大影響，歐洲各科學院均以此作為研究的參照和依據，其科學工作得到高度頌揚。1757年，劉松齡在京同伴、法國耶穌會士宋君榮（Antoine Gaubil）在致聖彼得堡科學院首席天文學家、柏林和倫敦科學院院士德利斯爾（Joseph Nicolas Delisle）的一封信中寫道：“彼（指劉松齡——筆者注）於測驗頗甚注意。彼對此既有時間，兼有傾向，所用者盡為熟練天文家如公輩作優良有益測驗之方法。”³¹當時，劉松齡觀測水星凌日以及交食時所產生的誤差與當時歐洲的計算是一致的，因此聖彼得堡科學院院士稱讚劉松齡“是繼湯若望、南懷仁和戴進賢之後北京欽天監中一位非常出色的天文學家”³²。而經過與聖彼得堡科學院的二十多年合作，1762年，劉松齡成為其榮譽會員；1765年，當選為聖彼得堡科學院的通訊院士。

同樣，劉松齡把當時歐洲較為先進的科學技術介紹到中國，對於欽天監準確進行各種天文觀測無疑有很大幫助。例如劉松齡利用六分儀測量北京的經度為 $39^{\circ} 54' 0''$ 和 $39^{\circ} 54' 2''$ ，這比戴進賢以前使用“半圓分角器”精准的多；1754年，劉松齡使用巴黎機械師朗格盧瓦（Langlois）的象限儀測算了北京的地理緯度。此外，他還分別比較了戴進賢1713年至1745年間在北京對木衛所作的觀測以及德利斯爾在聖彼得堡所作的觀測，由此準確地計算出北京的經度和緯度，並指出聖彼得堡與北京耶穌會修院之間的時差是5小時44分16秒，而非戴進賢以往測算的5小時44分55秒³³。

雖然劉松齡在欽天監任職頗久，但他沒有畫像留世可供後人瞻仰，世人只能從時人的記述中略知其貌。乾隆三十年（1765）來華的朝鮮使臣洪大容因為要向劉松齡、鮑友管二人問詢五星行度、曆法微奧以及購買觀天象的儀器等，故而到南堂拜訪了二人。洪大容對劉松齡和鮑友管的容貌作了比較詳細地描述：“劉年六十二、鮑年六十四，雖鬚髮已衰白，而韶顏如童，深目光如射，宛是壁畫中人也。皆剃頭衣帽為胡制。劉戴亮藍頂，鮑戴暗白頂。劉三品鮑六品，皆欽天監職也”；“二人皆吸鼻煙……二人皆戴眼鏡”³⁴。著名史學家趙翼在造訪天主堂時把劉松齡描述

為“虬須叟”^⑥。儘管難以完全復原劉松齡的容貌，但是他在華取得的科學成就、在溝通中西文化交流作出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1999年，斯洛文尼亞Črni Vrh天文台發現的第15071號小行星也以劉松齡的名字命名。正因為如此，劉松齡堪為中斯文化交流第一人。

①關於劉松齡的研究，國內稍早有鞠德元的《清欽天監監正劉松齡》（北京：《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1期），後繼研究者有高王凌、羅樂然；國外學者的研究以斯洛文尼亞學者為主，如Stannislav Južnič, *Hallerstein, the Last Great Jesuit Astronomer at Beijing* (unpublished); Zmago Šmitek, *Avguštin Hallerstein, Zbornik za zgodovino naravoslovja in tehnike*, 1993; Mandarin, *Hallerstein Kranjec na Kitajskem Dvoru, Muzej Menges*, 2003; Mitja Saje, ed. *A. Hallerstein- Liu Songling-劉松齡: The Multicultural Legacy of Jesuit Wisdom and Piety at the Qing Dynasty Court*, Maribor: Associ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Kibla, 2009.

②陳垣編：《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北平：故宮博物院，1932年，無頁碼。

③③①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56、306頁。

④⑤②②[法]樊國樑：《燕京開教略》（中篇），《中國天主教史籍彙編》，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92、394、388頁。

⑥15、16世紀是葡萄牙的全盛時代，它享有對東方的“保教權”，即所有前往東亞的傳教士應向葡萄牙政府登記、宣誓向葡萄牙國王效忠、搭乘葡萄牙的商船，葡萄牙政府負責提供傳教經費。當時，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幾乎為葡萄牙所壟斷。後來隨著法國國力的日益強大，國王路易十四一心想削弱葡萄牙在東方的勢力，遂自行派出傳教士前往中國，導致雙方在華傳教士關係並不融洽。參見拙文《清初法國對葡萄牙“保教權”的挑戰》，澳門：《文化雜誌》，2003年春季卷。

⑦《清實錄·高宗實錄》，卷二六三，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405頁。

⑧按照西方資料的記述，自湯若望開始，西洋傳教士長期在欽天監擔任監正。但是屈春海根據中文檔案資料，認為西洋傳教士只是在欽天監負責治理曆法，直

至1725年，雍正皇帝才正式將欽天監監正一職賜予戴進賢神父，接下來是劉松齡等。見屈春海：《清代欽天監暨時憲科職官年表》，北京：《中國科技史料》，1997年第3期。

⑨③⑤[朝]洪大容：《湛軒書》，《韓國文集叢刊》，第248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年，第248～250頁。

⑩耶穌會士魯仲賢（Jan Xaver Walter）1745年12月27日致波希米亞親戚的一封信，見Josef Kolářček, *Čínské epistolý*, Velehrad: Refugium Velehrad-Roma, 1999, pp. 144-147.

⑪⑩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187、172頁。

⑫鞠德元：《清欽天監監正劉松齡》。

⑬⑰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耶穌會傳教士劉松齡檔案史料》，北京：《歷史檔案》，2011年第1期。

⑭⑮⑯⑰⑱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Stannislav Juznic, *Hallerstein, the Last Great Jesuit Astronomer at Beijing* (unpublished), pp. 236, 79, 114, 86.

⑭⑮⑯⑰⑱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法]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馮承鈞譯，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783～784頁。

⑱Roberta J. M. Olson & Jay M. Pasachoff, *Fire in the Sk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2-33.

㉔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中國天主教史籍彙編》，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17頁。

㉖趙翼：《甌北集》，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7頁。

作者簡介：周萍萍，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博士。上海 200092

[責任編輯 陳志雄]